

亚非拉国家华侨华人青年中文姓名的使用与比较

张锦玉

(北京华文学院, 北京 102206)

[摘要] 采用调查的方法对亚非拉 52 个国家(不包括东南亚国家)772 位华侨华人青年的中文姓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亚非拉华侨华人的中文姓氏作为宗族传承的标志被凸显和重视,“姓+名”的结构以及单双字名的使用也反映出他们对传统的保持。其名用字体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并有一定程度的集中性;名用字的语义也符合中国传统价值取向。与东南亚华人和本土中国人的中文姓名比较发现,亚非拉华侨华人中文姓名的使用在各方面多呈现出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情况。这与群体的移民历史、社会背景、文化结构等宏观因素以及个体的教育层次、中文水平、价值观念等微观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

[关键词] 亚非拉国家; 华人华侨; 中文姓名; 使用频率

[中图分类号] D6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22)04-0012-09

一、引言

姓名是个体为了参与到其所在的社会团体并取得社会身份与认知而选定的特定名称符号^①。Walton 曾指出“一个人在出生后被赋予的名字会成为影响其人格发展、友谊获得、生活成功的决定性因素。”^②因此心理学界也曾就姓名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进行过诸多研究。这些研究发现,名字既能影响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也能反映群体的文化心理和偏好:在个体水平上,名字通过影响名字主人的自我认同或通过影响他人对名字主人的评价来影响其心理和行为;在群体水平上,名字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产品可以探讨社会的文化变迁规律^③。因此,从姓名保持的角度对移民及其后裔的研究就可反映出特定群体的文化和身份认同状况。Sue 和 Telles 便通过分析西班牙移民后代的名字,探讨了他们对美国文化的认同问题^④。

目前国内对类似跨文化移民的姓名研究也有了一些成果,包括海外华人的姓名问题^⑤。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都集中于东南亚地区,对东南亚之外的其他亚洲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华人的中文姓名保持和

[收稿日期] 2022-07-10 ;[修回日期] 2022-09-21

[作者简介] 张锦玉,河北张家口人,博士,北京华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华文教学、语音学。

[基金项目] 本文为北京市侨联 2022 年度重点调研课题“公共外交视域下东南亚 Z 世代华人文化统战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①张锦玉:《基于印尼青年华人中文姓名的社会语言学考察》,《八桂侨刊》2016 年第 3 期。

②Walton, W. E. ,The affective value of first nam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37, 21(4).

③苏红、任孝鹏:《名字的心理效应:来自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的证据》,《心理科学进展》2015 年第 5 期。

④Sue & Telles, Assimilation and gender in nam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7, 112(5).

⑤参看连涵芬:《东南亚华裔学生中文姓名用字研究》,《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钱莫香、李殿臣:《内地、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姓名用字的比较分析》,《语文研究》1999 年第 2 期;吴美意:《印尼华人姓名调查与研究》,厦门大学 2009 年硕士学位论文;张锦玉:《东南亚新生代华人中文姓名使用状况研究》,《华侨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

使用情况的研究却较为罕见。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对外输出移民的数量不断增长,大规模的中国新移民决定性地改变了世界华侨华人高度集中于东南亚的格局^①并逐步重组华人社团的结构;同时,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增强也使得一些华人族群内部出现了“再华化”的现象^②。在这种背景下,海外华人对其身份和文化归属的认同就可能出现新的趋势。因此,本文拟对学界关注较少的亚^③非拉华侨华人青年中文姓名的传承和使用情况进行研究,采用全新的第一手调查资料,探讨其中文姓名的结构、用字特征、文化内涵等问题,以揭示海外华人中文姓名所反映出的华人心理状况,弥补相关领域研究的不足。

二、调查过程与说明

(一)样本说明

本次调查的亚非拉华侨华人共 772 人,其中男性 373 人,女性 399 人,分别占总人数的 48.32%和 51.68%。由图 1 可见,调查对象中三大洲男性和女性的数量基本平衡,女性略多;从年龄上看,样本年龄大概介于 15—35 岁之间。调查对象主要是近 20 年来自京、闽、穗三地高校的留学生(包括长期学历班和短期项目班),其资料均从上述学校的招生和教学部门获得,还有一部分样本资料由外派教师和来华培训的海外华文教师提供,可信度高。调查选择的姓名样本均取自来华前已有中文姓名的华侨华人,对于无中文姓名和来华后由中国教师所起中文名的样本则未予收录。

本次调查涉及亚(除东南亚)、非、拉三大洲(见表 1)。三大洲内各国华侨华人分布的不平衡导致了调查样本分布不均,因此我们区分了“数据主体来源国”和“数据非主体来源国”两类,其中前者指样本人数在 20 人以上的国家。我们进一步对这两类国家的样本人数进行了统计,由图 2 可见,尽管数据主体来源国的数量不多,但其样本量均占到本洲样本的一半以上。

此外,为了比较亚非拉华侨华人与华人主要聚集地区——东南亚和中国本土的差异,我们还调查了同时代的 4 429 名中国人和 2 257 位东南亚华人青年^④作为对照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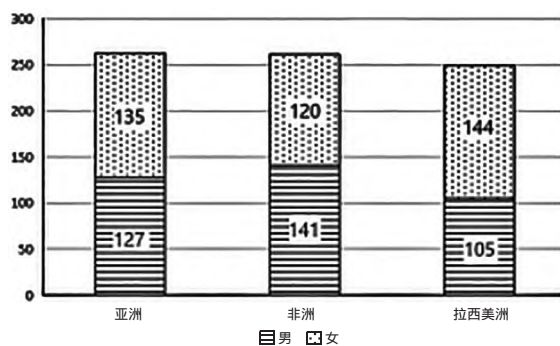


图 1 样本性别和大洲人数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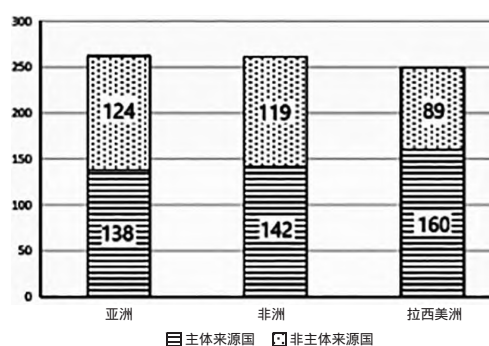


图 2 数据主体来源国与非主体来源国人数分布图

表 1 各大洲的样本来源和分布情况

	国家数	人数	数据主体来源国
亚洲	19	262	2 个:日本、韩国
非洲	20	261	3 个:南非、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
拉美	16	249	4 个:巴西、秘鲁、阿根廷、委内瑞拉

①庄国土:《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世界历史》2011年第5期。

②张小倩:《二十一世纪以来印尼华人“再华化”现象研究》《世界民族》2016年第1期。

③本文中的“亚”指除东南亚以外的亚洲地区。

④东南亚数据来源于张锦玉《东南亚新生代华人中文姓名使用状况研究》(2018)。

(二)数据统计

我们首先从各高校收集亚非拉青年华侨华人的基本信息,并根据调查条件进行筛选,剔除不合格数据。然后将样本资料逐条输入 excel 表格,并为每个调查对象设定若干检索标签,包括姓氏、名字、年龄、国籍、性别、院校、英文名等。制成姓名数据库后,采用 Matlab 软件编写姓名分析软件,并使用 SPSS 统计软件对以上各类数据进行统计,最后进行图表绘制。

三、姓氏

姓氏是维系血缘宗亲的纽带,是家族延续的标志,在中华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从调查结果看,很多亚非拉华人虽已加入所在国国籍,但他们还是大量而系统地保留了中文姓名,从而形成了“住在国名+中文名”的“双名制”^①。海外华人中,双名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频率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住在国名”一般应用于较为正式的场合,使用范围广;“中文名”则使用于华人社团内部和家庭生活等场合,范围有限。尽管如此,双名现象本身的存在还是反映了华人“对于自己的社会身份的认识,以及对于社会交际方式的确定”^②。如本次调查中,华人英文姓名的名字结构有“名+姓”和姓+名”两种,但不少人都在英文名中保留了中文姓氏的痕迹,如陈 Chan,邓 Teng,林 Lim,刘 Lau,张 Chang,王 Wong,李 Lee 等等,而就其中文姓名来看,则都保持了中国传统“姓+名”的结构特征,姓在名前的现象充分说明了华人重视血缘宗族的传承以及集体高于个人的传统意识。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共得到 158 个姓氏,单姓占绝对优势,只有一人名为“邓江明森”。谭汝为曾讨论过汉族四字姓名的五种形式^③,虽然“邓江”属于哪种情况不很明晰,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复姓。表 2 显示了亚非拉青年华侨华人前十位姓氏,总和占比 41.89%,前五大姓(出现 30 次以上的)的使用率占姓氏总数的 28.15%。我们又分别统计了不同使用率的姓氏数量及总和占比。结果显示,使用率在 5%以上的姓氏为前三名高频姓氏,虽然只占姓氏调查总数的 1.9%,但其使用率之和却占到 19.07%;而使用率在 0.5%以下的姓氏共 104 个,占姓氏调查总数的 65.8%,但使用率之和仅为 20.75%。此外,我们还对比了亚非拉与东南亚华人的姓氏分布特征。东南亚前十位姓氏使用率之和为 52.08%,前五大姓的使用率之和则占到总数的 34.85%。相比亚非拉地区,东南亚华人使用率在 1%以上的姓氏个数更少、占比更高,而使用率在 1%以下的姓氏个数更多、占比更低。这说明,较之东南亚地区,亚非拉华侨华人姓氏的集中度较低,表现出更多的分散态势。

表 2 前十位高频姓氏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姓氏	李	陈	张	黄	王	刘	吴	杨	林	徐
出现次数	56	46	45	38	32	29	22	20	19	16
出现频率%	7.263	5.967	5.837	4.929	4.150	3.761	2.853	2.594	2.464	2.075

具体来看高频的前十大姓氏,其中前五位分别是“李、陈、张、黄、王”,其出现次数均在 30 次以上,使用频率也超过了 4%。据资料,东南亚和中国的前十位姓氏分别是“陈林李黄张杨吴刘王郑”和“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由此我们可观察到以下特征:首先,亚非拉高频姓氏情况与东南亚更为接近,只是顺序有所不同。特别是“陈”姓,在亚非拉和东南亚地区的使用率都很高,排名也都很靠前。这也可以说明,与中国情况

①金勇:《20 世纪泰国社会华人姓名的泰化嬗变》,《当代亚太》2006 年第 5 期。

②纳日碧力戈:《姓名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06—107 页。

③谭汝为:《汉族四字姓名的五种形式》,《语文建设》2000 年第 10 期。

不同,“陈”是海外华侨华人使用率极高的一个姓氏,这与早期大量南方沿海地区移民国外有着重要的联系。其次,与东南亚不同,亚非拉华侨华人姓氏又兼具了中国国内姓氏的特点,即“李张王”三大姓氏的排名更加靠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亚非拉地区移民的来源和性质与东南亚不同,其移民很多属于当代新移民,且不限于南方沿海地区,来源地更为广泛。再次,从高频姓氏分布的集中度上看,亚非拉地区无论是在单个姓氏的使用频率还是前五位或前十位姓氏的使用频率之和上,数值均小于中国和东南亚的。如:使用率在6%以上的姓氏,中国和东南亚各有4个,而亚非拉仅有1个;前五位和前十位高频姓氏使用率之和与中国为35.06%和45.34%,东南亚为34.85%和50.04%,而亚非拉则为28.14%和41.89%。可见,亚非拉华侨华人姓氏的分布更加分散。这亦与该地区华人移民的历史和特点有关。

四、名字结构

姓名结构是姓和名在数量、位置、分布、关系等方面的特点。不同的姓名结构隐含着不同的社会、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楼光庆曾把世界上的姓名归纳为三种格式^①。一般说来,儒家文化圈的姓名多表现为“姓前名后”,更突出宗族和集体的地位;非汉字文化圈则表现出“名前姓后”或“有名无姓”的特点,个人和个性被更多地关注。在本次调查中,华侨华人住在国姓名的结构各不相同,但其中文姓名却都保留了“姓前名后”的特点,且名字的结构也与中国人的存在相似之处。

(一)单字名、双字名和三字名

中国人的姓名除姓氏之外,名字部分多为单音节或双音节,即中国人名以单字名和双字名为绝大多数。但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以及对标新立异的追求,近一、二十年也出现了不少三字名^②。本次调查中,亚非拉华人华侨的中文名全部为单字名和双字名,未出现三字名的情况。从单双字名的比例上看,双字名占优势,单字名只占总数的15.98%,差异十分显著($p < .001$)。由图3可见,尽管亚非拉、东南亚华人和中国人的姓名都表现为双字名占优势,但具体情况又有不同:东南亚表现为双字名的绝对优势(96.86%),中国单双字名的比例大概为1:2,亚非拉华侨华人则介于前两者之间,单双字名的比例约为1:5。从性别的角度看,亚非拉华侨华人男性和女性的双字名比例分别为83.914%和84.211%,二者非常接近,女性略高,但差异不显著,其与东南亚华人在该项上的表现十分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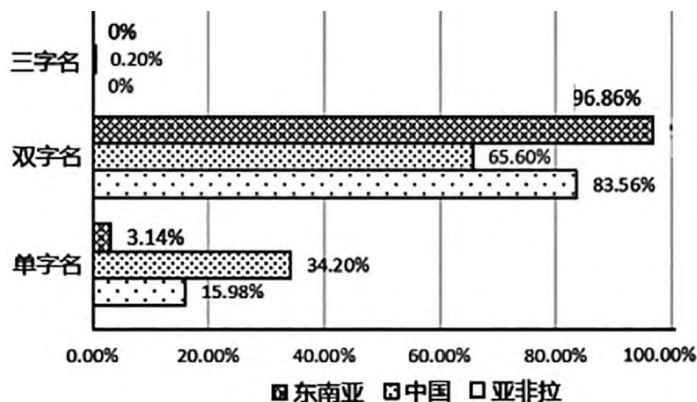


图3 中文名字结构比较图

相比以双字名占绝对优势的东南亚和单字名比例较大的中国,亚非拉华侨华人姓名的“居间性”实际上正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向海外移民特点的变化。庄国土曾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北美、欧

①楼光庆:《从姓名看社会和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3期。

②三字名表现为“姓+三音节名”,它与“双姓+双音节名”是不同的。如“王雨秋子”属于前者,“邓江明森”属于后者。

洲、澳洲以及日本、韩国等地华侨华人数量剧增的地区以外,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各地也出现了多个数以万计的华侨华人聚居区。以非洲为例,2006年到2007年新移民数量约为50万,占当地华侨华人总数的比例达到90%^①。这些新移民的身份大部分是商务移民、技术人员、劳务输出人员以及留学生。相比东南亚传统老侨(多为华工、非熟练劳动力等),新移民在文化程度、中文水平以及与国内的联系上都远远高于前者。因此在中文姓名方面,亚非拉地区华侨华人既传承着传统的双字名且用字更为丰富广泛,又保持了曾“被看成是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偏高的标志”^②且目前仍在中国占三分之一比例的单字名。尽管与中国国内双字名比例逐渐攀升的特点类似,但亚非拉华侨华人约16%的单字名使用率仍不能被忽视,这也是他们与东南亚华人中文姓名的重要区别之一。

(二)叠字名

叠字名是一种特殊的双字名,不过这种名的两个字是完全相同的,比如玲玲、佳佳等。在中国历史上,叠字名的使用较少;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叠字名逐渐出现,到八九十年代达到高峰,继而使用率又逐渐降低。尽管叠字名属于双字名,但它跟单字名一样,信息量和区别度相对较小,容易造成重名。因此近些年中国人使用叠字名的比例正在下降。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叠字名还是占到了一定的比例(见图4)。本次调查中,亚非拉华侨华人叠字名的使用率为2.979%,均低于中国(4.703%)和东南亚(4.610%)且差异显著($p < .001$),说明亚非拉华侨华人在命名方式上更注意创新和个性化。从性别角度看,亚非拉女性叠字名的使用率远高于男性($p < .001$),前者是后者的9.74倍,说明叠字名的使用具有明显的性别倾向。这种现象与叠字名的感情色彩有关,即具有“小、可爱、亲切”的含义^③,因此更适合女性。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中国本土叠字名的使用率均高于海外华人。这一方面说明中国人姓名仍受到八九十年代叠字名使用高峰余波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施行有关。由于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因此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被重视程度也急剧上升。如前所述,叠字名有“小、可爱、亲切”等含义,因此不太适合男性,但图4中,中国男性使用叠字名的频率几乎是国外华人的三倍,这可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父母对独子的重视和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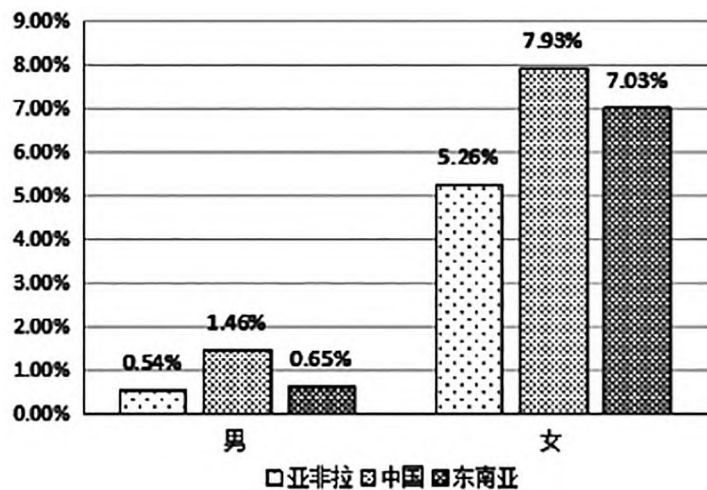


图4 叠字名比较图

①庄国土:《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世界历史》2011年第5期。

②曹志耘:《人命名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社会语言学研究室《语言·社会·文化》,北京:语文出版社,1991年版。

③周有斌:《叠音人名的考察与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12年第4期。

五、名用字特点

姓名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姓名的构成与习用是随着历史的演变、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①。它是一个社会特定时期的“窗口”,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因此,通过华人姓名中的用字情况,我们可以粗略推知海外华人华侨的价值观和身份、文化的认同情况。

由于不同性别名用字的差别比较明显,因此我们分性别进行了统计。我们考察了亚非拉地区华侨华人姓名用字的数量和用字率,并与东南亚和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对比(见表3)。亚非拉地区无论男女,其人均用字率都是最高的,而中国的人均用字率却最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样本数量的多少不同。我们知道,姓名用字的数量与被调查样本的数量并不成正比:样本人数大量增加,但用字数却可能增长得较慢,因为新增样本的用字可能已包含在已有样本用字之中,且样本数量越多这种情况表现得越明显。但是,我们仍能够从表3中发现一些现象。首先,尽管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但亚非拉地区人均用字率也明显高于东南亚。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亚非拉华侨华人在取名时用字相对分散,更加注重个性,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予以验证。其次,无论是哪个地区,人均用字率都明显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其中,东南亚差异最明显(0.149),亚非拉次之(0.099),中国差异最小(0.036)。一般来说,家族对某人姓名的重视程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于该姓名使用者的重视程度。比如古代男性都要入族谱,按辈分取名,过程严格慎重,而女性的取名则常依父母的喜好而定,比较随意。因此,用字率也许反映了不同地区和社会对于男性和女性社会地位观念的差异。故可大概推知,东南亚华人对于男性和女性社会地位的观念相对守旧,中国女性的地位则大大提高,亚非拉华侨华人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下面,我们将具体分析亚非拉男性和女性华侨华人名用字的具体特点。

表3 用字数量和用字率比较表

	男性人数	用字数	人均用字率	女性人数	用字数	人均用字率
亚非拉	373	321	0.861	399	304	0.762
东南亚	1 068	561	0.525	1 381	519	0.376
中国	2 276	750	0.330	2 153	634	0.294

(一)男性用字分析

表4 亚非拉男性高频名用字

	1	2	3	4	6	9	10
高频字	宇	杰	明	子天	鹏文伟	智	志远阳
出现次数	15	14	12	10	9	8	7
出现频率%	2.196	2.050	1.757	1.464	1.318	1.171	1.025

由表4可见,亚非拉男性华侨华人高频名用字的特点为:1.使用率超过2%的字有两个,分别是“宇、杰”;其他超过1%使用率的字还有10个,这12个高频字的覆盖率达到17.13%,显示出一定的集中性。2.从高频字的含义来看,大概分为以下几类:浩大(宇、天、伟、远),光明(明、阳),志向(杰、鹏、志),修养(文、智)以及当今较流行的“子”,用字特征显示出明显的中华文化特质。通过与东南亚华人和中国男性高频名用字的对比,我们发现,就高频字的集中度来看,亚非拉低于东南亚,表现为单字出现率和高频字覆盖率均

^①楼光庆:《从姓名看社会和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3期。

小于后者,其表现更接近于中国男性的情况。从高频字含义上看,亚非拉与中国更为类似,前十位高频字重合度达7个,而东南亚男性使用较多的则为“龙、安、文、家、俊”等字。因此亚非拉男性华侨华人在意义上更倾向于使用比较有文化含义的、有比喻、联想意义的字,而东南亚男性华人则更多关注的是个人德行修养、平安幸福和家族财富荣耀等方面,用字更为直白。

(二)女性用字分析

表5 亚非拉女性高频名用字

	1	2	3	6	9	12
高频字	丽	婷	欣慧敏	雯美莹	思君颖	佳文琪薇玉
出现次数	19	17	11	10	9	8
出现频率%	2.585	2.313	1.497	1.361	1.224	1.088

表5显示了亚非拉女性华侨华人1%以上高频名用字,共16个。我们发现,这些高频字出现次数相同的比较多,如并列第三、六、九位的分别有三个字。出现频率高于2%的有两个,为“丽、婷”,上述高频字的总覆盖率为22.585%,表现出一定的集中性。从高频字的含义来看,可分为以下几类:美丽(丽、婷、美)、聪慧(慧、敏、颖)、美好(欣、佳)、美玉(莹、琪、玉)、花草(薇)等等,主要都是体现女性特有气质和性格的字。对比东南亚和中国女性的高频名用字,我们发现了跟上述男性类似的现象。首先,亚非拉华人女性名用字的集中度较低,表现为:1.同一位次的高频字数量增多;2.“丽”同为亚非拉和东南亚女性的首位高频字,但其使用率差异明显,前者低于后者1.6%;同时亚非拉其他高频字的使用率也均低于东南亚,故前十位高频字的总覆盖率也低于东南亚,说明前者的高频名用字更为分散。其次,从高频字类型和语义上看,亚非拉女性名用高频字既有传统保守的一面,又有现代新潮的一面:“丽、美、慧、玉”与东南亚相同,“婷、敏、丽、佳、文”与中国相同,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更有特色的字,如“欣、雯、莹、思、君、薇、琪”等。这说明亚非拉华侨华人在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更注意名字的个性和创新。

(三)非常用字及生僻字

姓名中的生僻字反映出人们追求个性、标新立异的观念,它的使用在近几十年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这种现象在海外华人中亦有体现。因此,本部分我们将分析亚非拉华人华侨中文姓名中的非常用字和生僻字^①的使用情况。表6列出了亚非拉华侨华人名用字里的部分非常用字和生僻字。由此可以看出,非常用字在亚非拉华侨华人名用字中占一定的比例,但生僻字使用率非常低。表中所列例字多为书面语用字,意义深奥文雅、有意境。在这些非常用字和生僻字中,有些字是有明显性别倾向的,如“玥姝茜雯”等,多是书面语中表示与女性特征相关的字;而“锴韬瀚炯”等则显得宏伟大气,具有一定的男性特征;还有一些字是比较中性的,如“睿彦楠晔”等在不同性别中均有出现。

另外,无论非常用字还是生僻字,男性的使用率均大幅低于女性,后者是前者的两倍。这可能是因为男性代表了家庭的延续和传统,故父母更喜欢给男孩取传统的名字^②;但给女孩取名则更重视个人喜好,而非家族传承性,因此女性的名字则更为独特^③。

^①我们以2013年国务院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为字库,将一级字表外的字称为“非常用字”,将一、二级字表外的字称为“生僻字”。

^②Sue & Telles, Assimilation and gender in nam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7, 112(5).

^③Ellington, College students' given names: A test of the preference-feedback hypothesi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1, 31(1), pp157-169. Varnum & Kitayama, What's in a name? Popular name are less common on frontie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 22(2), pp176-183.

表 6 亚非拉华侨华人非常用字及生僻字统计表

	男性			女性		
	字数	百分比%	例字	字数	百分比%	例字
非常用字	39	12.150	睿纾钰彦瑜镭仕槽 泓鑫岐瀚昕翥韬烨 楠炯锴樊昊淇颀筱	72	23.684	睿馥楠澍旖襄荟婷雯祺茜玮纾 玥廿妍倩佶姍璨潺璐萱孜韦臻 彦歆茹淇奕姝懿琦裘媛
生僻字	3	0.935	翀岐晔	7	2.302	晔芷嫵珺珙珙嫿

我们进一步比较亚非拉、东南亚和中国三个地区中文名用字中非常用字和生僻字的使用情况（见图 5）。进而发现，就使用率来说，基本上呈现出“中国—亚非拉—东南亚”由高到低的分布，同时海外华人均表现为男性使用率低于女性的情况，正与中国相反。我们认为，尽管亚非拉与东南亚有一定的差别，但它们与中国的差别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别一方面表现在非常用字和生僻字数量和使用率的差异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不同性别使用比例的高低上。我们知道，一种语言现象的变化常常是从该语言的核心区向四周扩散的，因此，随着中国和汉语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增加，特别是大批中国人作为新移民定居海外，华侨华人在中文姓名的使用上也可能会逐渐向中国本土的特点靠拢，亚非拉和东南亚华人中文姓名特点的不同正说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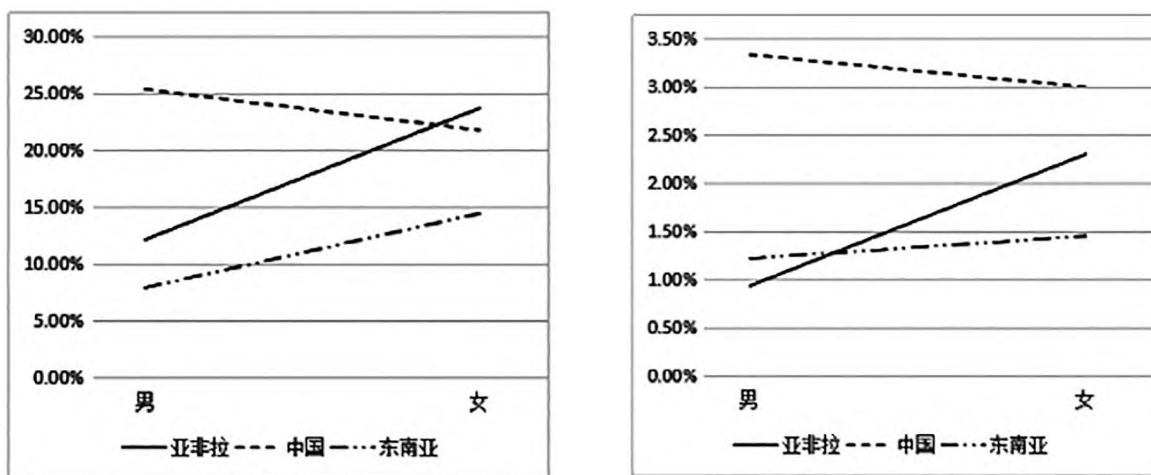


图 5 不同地区华人姓名非常用字(左)和生僻字(右)比较图

六、结语

名字不仅是人与人相互称呼的语言符号，也是研究社会心理和文化认同的纽带^①。因此，海外华人中文姓名的使用便可以反映出他们对个体身份和文化归属的认同情况。从本文的研究来看，亚非拉华侨华人保留了祖（籍）国姓名的“形式和内容”，即姓名的组合方式和姓名所传达的寓意^②。在形式上，姓氏作为宗族传承的标志被凸显和重视，“姓+名”的结构以及单双字名的使用也反映出亚非拉华侨华人对传统的保持。在内容上，亚非拉华侨华人名用字体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并有一定程度的集中性；非常用字和生僻字在使

①苏红、任孝鹏：《名字的心理效应：来自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的证据》，《心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5期。

②楼光庆：《从姓名看社会和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3期。

用中也偶有出现,表明其对名用字的范围具有一定的革新性。

在与东南亚和中国的比较中我们发现,亚非拉华侨华人中文姓名的使用在各方面多呈现出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情况。这其中有群体的移民历史、社会背景、文化结构等宏观因素,也有个体的教育层次、中文水平、价值观念等微观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亚非拉华侨华人双名制的存在以及双名使用范围的不平衡性反映出他们既想全力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又想保持自己华人特殊身份的观念。可见,海外华人中文姓名的研究也许能为移民群体的文化进化、身份认同、社会心理以及价值取向等问题提供一个崭新的窗口。

(责任编辑:郑春玲)

The Use of Chinese Name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and Comparison

Zhang Jinyu

(Beij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llege, Beijing, China, 102206)

Abstract : Using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the Chinese names of 772 young overseas Chinese who come from 52 countries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not included Southeast Asia) are researched in the pap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inese surnames have been highlighted and valued as a sign of clan inheritance. The structure of "surname+given name" and the use of monosyllable given names and disyllable given names also reflect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There are obvious gender differences and a certain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in the use of name words, and the semantic referential of name words also conform to the traditional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a.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names of Asian, 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overseas Chinese are mostly between the Southeast Asian overseas Chinese and native Chinese. This is related to the macro factors such as the group's immigration history, social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micro factors such as the individual's educational level, Chinese level and values.

Key words : Asian, 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he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Name; Frequency of Use